

南（海）三（水）边区 抗日民主政权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

陈锦辉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成立的背景

194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援救它侵入南洋的孤军，先后发动了打通平汉、湘桂、粤汉大陆交通线的作战。5月，长沙、衡阳等地相继失守。

7月，中共中央对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发出指示，敌打通粤汉铁路势在必行，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尽力发展抗日武装斗争。要把广东的武装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全省抗日游击战争。1945年1月，韶关沦陷后，省临委随即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四支部队向北挺进，开辟新区。并指示在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三水、东莞、宝安一带活动的部队，要坚持抗日斗争，发展武装队

伍，构成对广州包围的形势。

活跃在华南敌后战场的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切实执行党中央和省临委的指示，依靠群众，主动出击敌人，开展敌后游击战。武装力量得到迅猛发展。为了适应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继东江纵队成立后，1945年1月15日珠江纵队也正式宣布成立，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宣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

在南（海）三（水）两县交界地区进行抗日活动的“南三人民抗日大队”，也同时命名为“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该大队全体指战员为欢庆部队新命名，以战斗行动来庆祝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太事。攻克了敌伪要点官窑墟；夜袭了伪南海县侦辑大队长的牧牛沙农场；粉碎了日伪军对该大队部的围剿，与二千余众十倍于我的敌人战斗了七天七夜，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之后，部队在南（海）顺（德）边境理教、河滘等村进行了休整，在奉命重返南三边区的战斗中，又取得了胜利。恢复并扩大了抗日游击区。①

独立第三大队连战皆胜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信心，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部队战士和政工人员的宣传发动下，当地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主动交纳抗战军粮支援部队，欢迎部队进驻村庄，帮助他们成立政权。②

1945年5月，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部队活动范围的扩大，迫切需要一个解放区作为活动的依托；需要有一个人民政府，以便行使人民主权进行征收钱粮、筹划给养、医药和兵源的补充等工作。而且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不少村庄已在部队协助下建立起民兵组织

和乡村政权。建立一个南三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不仅是需要，而且条件也已具备。遂决定在南三边区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名为“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南（海）三（水）乡政建设委员会”（简称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统一领导南三边区的抗日民主乡政权，以支援部队的抗日斗争。^③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的建立过程及其 机构的设置与干部配备

1945年2日，独立第三大队在取得官窑战斗胜利后，便准备筹建南三边区抗日民主政权^④。但由于部队攻打三水乐平受挫，遭敌反攻，部队被迫撤回理教地区休整。鉴于该地区抗战初期已有地方党组织活动，人民抗日游击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群众基础好。经过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宣传工作，3月初，部队率先在理教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鳌龙吉民主乡政府，管辖理教、河滘、杏市等十条村庄。通过民主协商选举了正、副乡长，负责征粮收税，动员青年参军，配合部队开展工作。^④

此后，由于主力部队重返南三边区，原留守该地区的武装中队也于5月奉命挺进南三边，鳌龙吉民主乡政府即遭敌伪的扫荡而解体。它的存在虽然短暂，但却为以后“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故此，部队在重返南三边区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后，于4月至5月，先后建立了小榄、大榄、小埗、银岗（上述地方为南海县）、源潭、沙头、桃埗（上述地方为三水县，沙头现划为南海县）等联乡办事处，实施抗日民主政策。

1945年5月下旬，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经珠江纵队政治部批准，正式宣布成立。任命高柱天（高云）为主任、麦君素（麦少农）为副主任、委员有邓梦云、邓斌（邓展明）。委员会设于小榄墟。下辖小榄、大榄、沙头、银岗、小埗、桃埗、源潭等七个联乡办事处。管辖范围：东起南海县鹧鸪坑、南起南海县下旺田、西至南海县华平、北至三水县源潭。方横约二十多平方公里^⑤，人口约十万^⑥。

联乡办事处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设置民兵常备队，设队长一人。下辖附近各村，设村长一人。出任上述职务者，均通过各阶层代表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为了加强联乡办事处的领导，独立第三大队抽调了一批政工干部到各联乡办事处任指导员。^⑥

政权机构序列和干部名单：^⑦（详见第五页）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的施政概况

抗日游击区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组成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它的根本任务是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支援部队打仗消灭敌人。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保卫抗日政权的建设。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各联乡办事处成立伊始，即设民兵常备队，负责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坏人的破坏，保护群众的利益。先后捉拿了破坏农业生产、偷盗耕牛、散布谣言、煽动群众拒交军粮的不法分子黄昌等人，并予以处决。消除村族械斗，协助部队征粮收税，维持墟场秩序，保证了商贩往来的安全，买卖公平。因此，市场十分兴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

主任：高柱天 委员：邓梦云

副主任：麦君素 委员：邓 斌

小榄联乡办事处	指导员：霍 祥 民兵常备队长：黄文秀 主任：刘天黎
大榄联乡办事处	指导员：李 毅 民兵常备队长：颜 玉 主任：周忠义、丁剑平、颜华芬
沙头联乡办事处	指导员：（待查） 民兵常备队长：潘锦隆 主任：（待查）
银岗联乡办事处	指导员：陈 见 民兵常备队长：陶东良 主任：郭 诚
小埗联乡办事处	指导员：（待查） 民兵常备队长：黄 七 主任：张腾甫
桃埗联乡办事处	指导员：邓梦云（兼） 民兵常备队长：何新荣 主任：潘玉枢
源潭联乡办事处	指导员：陈 焕 民兵常备队长：禰钧华 主任：（待查）

旺，人民群众得以安居乐业，辖区出现一派新的景象。^⑧

1945年4月底，敌、伪加紧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扫荡”、清剿，在番顺地区“围剿”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接着也对南三边区进行“扫荡”。从佛山、广州等地进犯的伪军来势汹汹地首先包围了大榄乡。企图扼杀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大榄联乡办事处于摇篮中，却受到已组织起来的民兵队员英勇抗击，无法逾越村内一步。期间，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刚攻克了三水源潭敌据点，闻讯后，即派出一个中队驰回大榄，并得到在黄洞整编的西挺部队的支援，把来犯之敌击退。保卫了大榄乡民主政权^⑤。

民兵组织在配合部队作战，粉碎敌人的扫荡，保卫民主政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参加战斗中锻炼了自己，壮大了队伍。到5月底止，各联乡办事处的民兵常备队已发展到数百人^⑩。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辖下的区域，一律废除日伪统治时期的各种劳役及苛捐杂税，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佃农与地主重新订立租约，经过部队和民主政府的宣传，很多中、小地主和开明绅士都乐意接受我党的政策。实行了“二五”减租减息^{⑩②}。广大群众更是乐意交纳公粮和税项，支持部队的建设。4月下旬，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在番禺、顺德粉碎了日、伪、顽的联合进攻后，由纵队副司令员谢斌等率领部队转移到黄洞村集结整编，准备挺进西江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小榄、大榄、银岗联乡办事处刚成立，乡政建设委员会也正在着手筹建，但当地群众得知大军到来，便踊跃自愿预借当年早造军粮2000余公斤大米支援部队，帮助部队解决了整编时及西挺广宁途中的粮食困难^⑧。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重视拥军优抚工作，组织群众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等物资，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向部队输送人员，积极组织代耕队，帮助军烈属，并以办识字班和夜校的形式，发展民主政府的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⑩。

为了巩固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提高乡政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在独立第三大队的具体领导下，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地方干部积极分子培训班”。各联乡办事处共选送了60多人参加培训班，结业时，有17名学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⑪。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开明绅士和爱国人士，让他们参与民主政府的工作。尽管有部分人以前干过坏事，但在部队来到后，已改邪归正，并立了功，也安排他们在本乡民主政府担任要职。三水县潘玉枢，原是国民党桃埭乡乡长，独立第三大队挺进南三边区后，使他看到这支队伍是真心实意进行抗日的，部队领导找他谈话后，他决心改邪归正，提供敌情，使游击队截获了伪三水县政府调查主任及第五区征收主任的船只，缴获了一批物资和现款。此后，桃埭联乡办事处成立，他被协商选举为办事处主任。黄七、张世良是南三边区的地方实力派，在我军事攻势和统战工作下，投靠了独立第三大队，他们所统率的伪联防队也接受了部队和民主政府的改造。他们本人分别被抗日民主政府任命为小埭联乡办事处民兵常备队正、副队长，在维护当地治安，配合部队作战发挥了他们的作用^⑫。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在珠江三角洲抗日

游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1945年8月15日，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持久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8月18日，中共广东区党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指示，作出了“迅速北挺创造战略根据地”的决定。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等组成粤北指挥部，率部北上，准备与王霞、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会师，开辟五岭根据地。8月23日，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共四百余人，在三水县源潭集结，举行挺进粤北誓师大会。会后，部队由郑少康、梅易辰等率领，取道花县、清远挥师北上。

独立第三大队挺进粤北后，留下了一批民主政权干部和20余人的武装队伍，由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主任高柱天领导，在南三边区坚持斗争。他们依靠群众和民兵力量，击退了源潭襁绍祥反动武装的进攻，保卫了源潭乡民主政权。镇压了企图颠覆抗日民主政权，散布谣言、煽动群众的反革命分子刘二等人。稳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使民主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得到保证。

194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原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南三边区的形势越来越险恶。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乡政干部和留守武装人员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进行活动，以对付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近二千人的围剿。但由于敌强我弱，屡遭敌之包围进攻，于12月初，乡政干部和留守的武装队伍奉命分散撤离南三边区，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也

同时结束^⑩。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历时仅七个月，时间是短暂的。但它在珠江三角洲的抗战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使南三边区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支持了本地区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而且还支援珠江纵队一部胜利地完成了西挺广宁、北进五岭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战略转移任务。在夺取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自已的积极作用。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是南海、三水两县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产物，是珠江三角洲党组织和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战时期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武装力量，搞好统战工作的重要体现。

1988年7月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①南海、三水县党史办合编的《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队史大事年表》第13—19页。

②邓伟《在南三的武装斗争生活》，见《三水县地方党史研究资料》第二辑第65页。

③叶向荣、林锋《人民的抚育，战斗的磨炼——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的成长》，见南海、三水县党史办合编的《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集》第59—62页。

④《访问麦君素同志记录整理稿》，见南海县委党史办出版的《党史参考资料选编》19辑第5页。

⑤《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史》（第二稿）第26—28页。

⑥《高柱天、麦君素同志简谈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的建政情况》。

⑦《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史》（第二稿），南三人民抗日民主政权系统表；《南（海）三（水）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征求意见稿）高柱天的修改意见。

⑧高柱天《抗日战争时期南三地区的斗争》，见《三水县地方党史研究资料》第二辑第14—21页。

⑨潘锦《南三独立大队在南三敌后斗争的历程概况》，见南海县委党史办出版的《党史参考资料选编》26辑第85页。

⑩麦君素《抗战后期南三独立大队武装斗争》，见《三水县地方党史研究资料》第二辑第56页。

⑪《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大事年表》第24页。



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机器造纸厂

南海盐步造纸厂始末

陈华新

南海县盐步造纸厂，其前身为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创办于1883年，是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创办的机器造纸厂。

钟星溪与宏远堂

1881年，美国商人在上海杨树浦开办上海华章纸厂，于1884年投产，获取厚利。南海县盐步水藤乡商人钟星溪（锡良），认为造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让外国人在中国办纸厂，利源外溢，不若自办纸厂，发展民族造纸业。于是，他决心筹办一家机器造纸厂，选定以水藤乡为厂址。此地旁依江滨，是广州、佛山的水路交通枢纽，原料和产品可由水道运输，交通方便。造纸所需大量工业用水，江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自己家乡办厂，又可得到廉价劳动力。

厂址选定后，遂在水藤乡购地三十亩，1883年公开招股，每股10两白银，共招得15,000股，资本150,000两。仅粤海关司库周荣曜，一人就斥资33700两，认购3,370股。于是，成立了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每年向清政府缴纳白银1,000两，取得10年专利权。

由于周荣曜在粤海关工作多年，认识不少洋人，他又是大股东，对筹办该公司也颇为尽力。通过周荣曜的物色，向英国爱丁堡柏川公司（Bertram & Son）购进造纸机器设备，计有500马力的炉面蒸汽机全副，360K·W发动机一副，电动马达20具，抽水机两副，蒸煮及焙纸用的汽锅炉三副，切布连除尘机二副（后一副报废），立筒式汽甑三具，球形汽甑一具，英造荷兰机10具，德造荷兰机一具，1886年英国新出纸机及切纸机各一副。这些机器设备共化去100,000两。爱丁堡柏川公司派出监造师霍斯保（Horsburgh）、工程师葛列森（Grierson）前来安装机器，又从香港延聘英人约翰斯顿（A. Johnston）任工程师。公司雇用工人100名，其中有些是旅美华工归国的熟练造纸工人。这种设备和技术力量，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其规模也比美商在上海创办的华商纸厂大一倍。经过多年筹建，于1889年投产，日产纸62担。

宏远堂所用的原料是破布、旧棉絮、稻草等，从四乡收购，原料充足，生产成本低，产品称宏远堂纸，又叫“西洋纸”。这种纸质的不足之处，就是表面光滑坚硬，吸水性差，不适宜于书写毛笔字。当时国内大量需要的，仍以能书写毛笔字的毛边纸为大宗。结果，宏远堂的产品只能供印刷和包装之用，不能广泛占有国内市场。加上经营管理不善，1894年股本亏损殆尽，周荣曜又追加投资37,000两。一个海关的僚属司库，先后投资了七万两白银，自然引起一些勾心斗角官僚的注意。后来经过清查，发现周某果然贪污了大量关库白银，遂将他的股份全部充公。

岑春煊、周馥与增源纸厂

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派郑勤业到宏远堂查办周荣曜贪污案，乘机吞并原来的商股，不仅把周某的股份充公，还提出旧股折半计算，不愿继续入股者可退股。又借口钟星溪伪造股票，把他属下的305股也充公。经过一占二吞，商股仅存十分之一，官股十居其九。于1906年更名为增源纸厂，核实资本为115,000两，更改厂名之初，颇有起色，一年内收入13.4万两，除去成本开支，盈利22,877两，按14成分配，提取2成为报效银2,800两，2成公积金2,800两，8成为股息金11,500两，2成为花红银2,800两，尚余银2,977两。

但是，增源纸厂的盈利，并不是改进生产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结果，而是采用行政命令干预，强迫人民购买增源纸厂出产的“官纸”。1906年8月（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由周馥继任两广总督，进一步实行官纸专利。于1906年12月13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廿八日）颁布《晓谕诸色人等领用官纸由》：

“所有文武衙门，应用一切公文纸张、粮串、状纸、各项单照，并当铺、餉押发票以及山票、铺票等项，均须遵用官纸，以归划一。其学堂课本等项，自应遵照宪批，徐图推广。除派员分道驻往各属调查各衙门应用纸样，并会同地方官详细查取所属地方当铺、餉押牌号间数，每间每年应用发票张数，查取到日，以凭印刷，发县给领，暨移请善后局传谕山票、铺票商人，即日备价赴局领用外，合行示谕，为此示仰诸色人等，一体

遵照”（《广东官纸印刷局公文始末纪略》卷一）。

规定当铺商号、学校用纸、各级衙门用纸以及打官司用的状纸等，都必须用增源官纸才有效。并乘机敲竹杠，规定状纸每张售价一元（后降至六角），若非用官纸写状，不管人命关天，概不受理。对于周馥的施行官派专利法，南海、番禺等县商民，曾实行抵制。“南番两属”的“当押商”，“以纸价较昂”，“纸色不合”，“指为苛细杂捐”，“以为抵抗地步”（同上书卷二）。惠州商民也响应南海、番禺的抗用官纸，他们以“纸张繁重，道途遥远，转运不便”为理由，“请准免领”。一些商号甚至宁可每年多缴二十元，也拒绝领用官纸（同上书）。在商民的抵制下，增源纸厂“销路较滞，积货多至五万余两，成本压搁，周转为难”（同上书卷三）。增源纸厂产品滞销的另一原因，就是厘金太重。1907年9月2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纸厂总办于《禀陈厂纸滞销情形》的报告说：

“洋纸及香港大成纸厂之纸行用三联票，每百斤仅完税银2.84钱，无论行销何处，概不完纳税厘；而本厂机器纸，查据司事禀复，以1,100斤纸运至三水，厘厂照料半纸强作1,200斤，每百斤收银1.2钱，共计银1.44两，再加添平挂号关艇填票放行等项名目，计银2.50钱，再至后沥潞、三水需加4百斤，又代三水加收400斤，以1,100斤之纸虚作二千斤，收银2.4两，另太平关艇等银1.56钱，至芙蓉厘厂验票，不收厘，仅收挂号1角，关艇1角，又运到梧州完纳半税银13.86两，府税银5.414两。如往南宁等处，加完半税银13.86两，总共需银37.53两。以洋纸行用三联票比较，竟加10倍有

余。厂纸滞销无怪其然”（同上书）。

绵远纸厂的复兴

增源纸厂在宣统年间已奄奄一息，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因机器残缺而倒闭。龙济光督粤时，由容某以5万元向财政厅承盘，复改为商办。因资本不足，加上股东发生矛盾，经过两次改组，最后由港商李石泉（盐步人）、冯平山、庞伟庭、冯伊需等合资经营，更名为绵远纸厂。

绵远纸厂成立董事会，设董事三人，司理一人。司理执行董事会主席的意旨，总管全厂生产和供销，相当于总经理。最初的司理是佛山人庞星南。司理之下，有管工2人，司账1人，又于切纸部、拣布部、切布部、甑煮部、制纸部、磨浆部、修理部、烧火部、司机部、电气部各设工头一人。由于管理体制的改革，生产大有起色，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纸进口锐减，三数年间获利十余万元，经股东大会决定以盈利进行扩大再生产。由于旧有的卧式蒸汽发动机落后，耗煤多，效率低，改用新机，向德商礼和洋行定购500马力的炉面蒸汽发动机一座，既省煤，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后来又利用发动机发电，用电动马达拖动各制纸机，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每天产纸7千斤，分10刀、6刀两类，10刀有燕喜牌10刀、万福牌10刀、栗牌10刀等，6刀有松鹤牌6刀，此外，尚有生产各种包装纸。产品多销售本地，如广州的易芸生、罗寄生等烟丝厂，各乡熟药、苏杭绸店，均用绵远出产的包装纸，还远销港澳南洋各地。后来由于该公司属下的北江行和发行所发生火灾，损失数万元，加上战后洋纸进口复增，该厂的生产又陷入困境。

盐步造纸厂的浩劫

1928年，绵远纸厂宣告停产，将部分股额让与协同和机器厂，经广东机器总工会李德轩出面，与纸厂董事会主席李石泉订立劳资合作协议书。协议书共有十款，规定厂东不收厂租，工人只领取生活费，赢利按劳、资平均分红。在未合作前，纸厂每月开支约1千4、5百元，与收入差不多，一遇生产发生故障就面临亏损。合作后，工方推李志轩为总管，李貽盈为监工，他两都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生产毫无起色。1929年，股东会议议决将厂拍卖，由盐步造纸厂以10万元购得，由于工人极力反对，又订立了两年劳资合作合同，至1932年改名为盐步造纸厂。这时，香港大成纸厂停工，废、旧布供过于求，由每担3.6元降至1.8元，纸厂利用这些廉价原料发展生产，又改用谷糠为燃料，每天节省用煤七、八吨，仅此一项每天便节省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元。生产成本大大下降。日产厚包装纸13,000斤，薄包装纸9,000斤。到1936年，盐步造纸厂资本已增至40万元，成为南方一个规模较大的造纸厂。

好景无常，1938年10日，广州沦陷，盐步造纸厂被日本强行接管，派遣久保为日方代表。久保曾在绵远纸厂当过技师，因耍流氓行为被遣送回国，这次卷土重来，腰挂长剑，大施淫威，在纸厂干尽坏事。1945年抗战胜利，纸厂被列为敌伪财产接管，许多设备被化整为零盗卖。圆网机的铜网，被转手卖给蛇王满做蛇笼；制纸用的纯毛干湿毡，被盗去市场论尺拍卖。纸厂停产，工人失业，生活无着。后来，通过华侨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据理力争，才恢复生产，日产纸四、

五千斤，质量也远不如抗战前。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准备把该厂迁至海南岛，盐步人民奋起护厂，迁厂虽未能得逞，但国民党政府撤退时，陆边大天二陆芬、陆亚细等，乘机洗劫，连厂房的桁杉，也被残兵地痞拆去变卖和当柴烧。具有六十多年历史的盐步造纸厂，在多次浩劫下满目疮痍，令人目不忍睹。解放后，据说把剩余的部分残缺不全的机器设备，支援广州造纸厂和江门造纸厂。盐步造纸厂的沧桑史，是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缩影。尽管这些都成为历史，但盐步造纸厂作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创办的造纸工业，它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地位，却是不可抹杀的。

1988年4月23日

